

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以美日在非洲遏制“一带一路”为例

钮维敢, 邢毅

(北京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616)

摘要:“一带一路”在语义内涵和实际地缘上都与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脉相承。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对外扩张导致自身陷入战争泥潭,美苏对抗态势逐渐由美攻苏守转向苏攻美守,两国的军备竞赛日益利好于苏联。面对国际局势的风谲云诡,毛泽东顺势而为在论述“中间地带”理论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以求联合第二、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对马列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纵使穿越时空投射在“一带一路”所涉区域及相关行为体上,仍然对相关第三世界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遭遇的冷战思维挑战具有较强的洞察功能和完善的学理解释力,能够穿透性厘清美日在非洲挑战“一带一路”的经纬,并挖掘其西方普世价值观根源。“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遭遇的美日冷战思维挑战,是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当代典型实例,从孤立第一世界、争取或分化第二世界、团结第三世界的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方法来设计应对美日在非洲对“一带一路”的冷战思维挑战,进一步彰显该理论在当今国际关系重新洗牌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仍具有强大国际统战引领力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一带一路; 非洲; 冷战遗留视角; 大国博弈

中图分类号: D82/A8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23)04-0081-11

“三个世界”一般被国际关系学界用来描述国际格局的态势,尽管它也曾是抽象的哲学概念^①。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的视域,剖析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审时度势、精准把握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将统一战线方法应用于国际舞台的新实践——毛泽东

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并选用美日在非洲遏制“一带一路”的典型实例来论证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来自外部势力的挑战。斯里兰卡为减轻债务负担,以

作者简介: 钮维敢,男,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遗留问题与中国外交;邢毅,男,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和全球安全治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遭遇的冷战思维挑战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8)。

经济形式将汉班托塔港的部分固定资产和经营权移交给中国招商局集团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彭斯在哈德逊学院发表的演讲中,直接以“债务陷阱”来污蔑中国对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的投资,使得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产生误解^[1]。无独有偶,立陶宛原本也是“一带一路”的合作国家之一,甚至是“一带一路”上的“潜力股”^[2],但由于受美国和西方大国的挑唆及威逼利诱,其对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毁弃“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而且声称吸引或接受中国投资将会导致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受到更严重威胁。而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地区中,也发生了类似斯里兰卡这样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和基础建设,却反被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污名化来遏制中国、挑战“一带一路”的案例,且有上升之势。

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政治局势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的格局并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国际格局持续风云诡谲,对此,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是否仍有科学的解释力?如果是,那么其解读“一带一路”遭遇冷战思维挑战所洽合的学理逻辑是什么?应如何发挥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优势设计应对“一带一路”遭遇冷战思维挑战的策略?

二、既有文献回顾

自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一战略思想以来,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又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此之后,学界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但国内外学界对其认知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专门研究较为鲜见,大多是在对毛泽东个人、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涉及关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论述,并且受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和外交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持否定态度。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由于苏联对华态度的急转直下,这类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典型的利己主义,是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修正。最为典型的是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认为毛泽东并不是以阶级为标准来划分三个世界,而是鼓吹阶级合作,将实际上复杂的、动态的世界简单化、静态化,忽略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是典型的修正主义^[3]。另一类则是西方学者。他们总是带着主观性的判断、意识形态的色彩和冷战思维的眼镜来评价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鲍大可(A.Doak Barnett)在《中国与东亚主要大国》一书中认为,北京三个世界的构想是在阐述第二世界的价值和第三世界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毛泽东之所以划分三个世界,更多的是为抵消苏联的影响力而提出的一种以现实政治为动机的力量来平衡的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督促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4]17-18。

尽管如此,也有部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持认可的态度。例如日本学者村上敏明高度认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世情和日本的实际国情,驳斥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谬论,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大方向^[5]。库巴尔科娃(V.Kubalkova)和克鲁斯克沙克(A.A.Cruickshank)合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中,同样认为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是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体现^[6]109-110。彼得·万·内斯(Peter Van Ness)则在《革命和中国外交政策》中详细阐述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帮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具体原因^[7]210-212。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看法两极分化,而且集中于苏联解体之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外对于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相关研究呈断崖式下跌状态。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中国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始于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一文中通过四个主要问题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其党报《人民之声报》上抹黑、歪曲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的有力回击,论证了毛泽东思想三

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8]。自此之后,中国主流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了肯定性研究。进入新时代以来,李娟结合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具体实践与延伸,也是对中国外交理念的进一步发展^[9]。王新影和李雪梅则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界格局变化作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中透析其中蕴含的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深刻解读了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现实启示和时代价值^[10]。可以发现,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大都呈肯定态度,但就探究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研究角度、动因探析,以及与现实国情、世情相结合而言具有何种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该理论对着眼于应对途经第三世界的“一带一路”所遭遇的冷战思维挑战,还存在有待拓展和深挖的研究空间。

(三)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仅从国际关系或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没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因。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国形势和世界形势相结合,根据历史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三分世界。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放性和创新的发展性。

其次,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诞生正处于冷战两极国际格局阶段性质变时期,显著表现为美苏两极力量消长不断转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内部调整带来的国际矛盾进一步演化。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是在这一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并随着不断出现的新矛盾而进一步完善。大部分学者对此所作的研究,往往从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维度建立认识框架,只重视冷战带来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而没有看到两极格局阶段性质变

引发的其他国家与美苏霸权主义的矛盾。

最后,相关研究缺少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共进,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当代价值的考察较为空泛。在国内外诸多对于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研究中,虽有提及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现实启示和时代价值,但大多从宏观角度建立理论框架再进行阐释,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没有通过对实际案例的研究来检验和进一步完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缺少与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

针对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系统分析其动因、理论内涵、战略思考及其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美、日两国在非洲阻击“一带一路”的现状,进一步论证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对相关研究中的不足进行补证和完善。

三、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多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且中国外交举步维艰的形势下以“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为基础提出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原创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旨在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在危机四伏的世界大势中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

(一)毛泽东思想“中间地带”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力量分化重组,传统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以美苏为两极的国际格局开始形成。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美苏两国并未延续战时的同盟关系而是渐变为敌对关系。1946年8月6日,面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的“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除非美国在进攻苏联前将美苏之间隔着的中间地带——欧、亚、非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否则根本谈不上进攻苏联^[11]^[193]。毛泽东强有力地揭露了美国的霸权战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在争取主权独立上存

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中期,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其成果,使毛泽东深入认识到了除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既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审视国际政治力量分化状况,得出帝国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的观点,并提出了美帝国主义属于一种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属于一种力量,被压迫的亚非拉民族国家属于一种力量的论断^{[12]341}。这为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过渡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力量即除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客观上对于他们摆脱美国控制的强烈愿望起着助推作用。时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在设计欧洲联合战略时,便通过团结法国周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极力降低抑或摆脱美英对欧洲的控制力和国际影响力,以求实现“欧洲人的欧洲”的夙愿。毛泽东对此评价:所谓西方的团结正在一步一步破裂的过程中,虽然还没有最后决裂,但是其要求的所谓“团结”仍是在美国控制之下的团结,所以最后决裂是不可避免的^{[12]361}。因此,毛泽东进一步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划分为四个层次,并指出“中间地带”有两个: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经济尚且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3]343}。从“中间地带”理论进步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最明显的演进是在主体的认定方面,由之前“美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地带”转变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地带”,并进一步对中间地带的行为体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类别细分^[14],这也成为之后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认知框架的雏形。

(三)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形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在对当时国际局势进行冷静观察、精准分析和科学判断的前提下,补充、完善和发展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将苏联明确界定为斗争对象,划入第一世界,同时将“两个中间地带”的国家

划分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在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公开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4]。此前,尽管“三个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提法也有出现,如《大英百科全书》第9卷指出:“第三世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指亚洲和非洲等不同于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工业国家的殖民地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1966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发表《三种发展阶段的世界》一书,认为“第一世界”是指美国统治的西欧盟国以及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卫星国”,“第二世界”是指苏联及其统治的部分东欧和亚洲的盟国以及“卫星国”,“第三世界”是指在亚、非、拉地区的不结盟的非“卫星国”^[15]。但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跳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认知框架的局限,从冷战两个霸权主义主体及其之间诸多行为体的力量变化状况和实际出发,对“三个世界”作出了符合当时国际战略形势的新解释。

(四)“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

毛泽东思想“中间地带”理论对“中间地带”的论述,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的发展历程,但在本质上仍属于处在争夺单极霸权的强大行为体之间的力量——中间游移力量^②,所以在下文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对比中不再作单独区分,而是将其统称为“中间地带”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毛泽东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中间地带”理论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实践参考和路径探索,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则在继承“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概括和宏观再凝练。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着较明显的区别。“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从中微观层次着手,通过分析国际行为体并对比其力量消长而提出的一种战略策略,更具现实主义倾向。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更多

着眼于对国际体系、秩序及其运行机制的分析,不再仅仅局限于原有的阵营之分,而是在宏观上侧重于从国际阶层和阶级方面对世界进行划分,进一步明确了需要斗争的对象,是富有全球性和国际社会性的战略理论。除此之外,毛泽东三分世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了解放被压迫民族和落后地区人民,但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中的部分国家并非完全反美反苏,甚至对美、苏有一定的依附性和依赖性。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见表1)。

四、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内涵和战略思考

(一)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研判当时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提出的,是合理有效的方法论,对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以及之后国际格局的演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 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毛泽东把整个国际社会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并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中,精准把握了不同类别国家之间的实际动态,并根据其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将之概括为“三个世界”,指出了“三个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即作为第一世界的美苏两国为谋取世界霸权,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对第三世界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进行干涉和控制,同时为彰显自身国际地位,还对处于第二世界中实力相对较弱的西方国家进行打压。因

此,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在不同程度上均有谋求领土主权完整和摆脱美苏奴役控制的愿望,这就在实际上涵括了世界多极化力量的客观存在,也充分体现出毛泽东致力于利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矛盾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践行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构想。

2. 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存在多种政治力量,如何对这些政治力量进行科学划分,把握其内在主要矛盾?毛泽东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给出了解释力极强的答案。毛泽东深入分析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民族矛盾,指出作为不发达国家最关注的是更为显著的民族矛盾,是民族独立国家与美苏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也明确了美苏两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霸权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是主要敌人。但是又因西方发达国家在受美苏剥削压迫,尝试借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美苏进行牵制的同时,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亚非拉国家在努力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盘剥、压榨的同时,也不免对美苏超级大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依赖心理^{[16]59-62}。所以毛泽东从诸多矛盾中准确把握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反对霸权主义,厘清了三个世界之间的不同矛盾状况,为推进构建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也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3.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打破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阵

表1 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对比

比较项	中间地带(中间游移力量)	三个世界
含义	一个“中间地带”: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两个“中间地带”: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经济尚且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世界:美国、苏联。 第二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 第三世界:亚洲(除日本)、非洲、拉丁美洲。
学理倾向	中微观的战略策略,侧重于现实主义。	宏观的、全局性和国际社会性,有理想主义的成分。
方法论	侧重于力量结构和力量角色是一种偏具象性的理论。	侧重于国际阶层和阶级划分,是一种偏抽象性的理论。
斗争对象	界定不明确、较为模糊。	明确美、苏(特别是将苏联界定为斗争对象)。
关系	“中间地带”理论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实践参考和路径探索,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宏观提升。	
目标	相似或一致,都是致力于运用国际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注:该表由笔者归纳自制

营和外交指向的固有藩篱,认识到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有霸权主义倾向;中国不能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否认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且苏联与美帝国主义相比,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17],必须将苏联与美国列为共同斗争的对象。除此之外,毛泽东并没有将整个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一概而论,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其中部分成员既属于压迫者又属于被压迫者的实际,将其归于可以联合反霸的统战对象,划分为第二世界。同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也是对当时国内外质疑“联美抗苏”战略的一种缓和与回应^[18]。

(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战略思考

1.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反映了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1969年珍宝岛事件使不断紧张的中苏关系直接暴露出来,之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寻衅滋事,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毛泽东主张“不要四面出击”^{[19]75-76},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其他更突出问题的战略方针。因此,先后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以求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但此时的美国并未完全放弃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中苏以往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也导致了国内外出现对于“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不同声音。如何在消除这些声音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现阶段苏联和美国的斗争不再单纯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其目的主要是为争夺世界霸权,损害的是美苏之外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将美苏一同划分为第一世界,是受害国亟须共同反对的对象。

2. 三个世界理论反映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唯物辩证的战略思维。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正确地指出国际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美苏霸权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中苏关系恶化,甚至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在资本主义阵营方面,日本的垄断资本与美国也并非表面上的团结,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等与美国也不是那么团结^[15]。因此,毛泽东抓住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将后者从资本主义阵营中剥离出来,划分为第二世界。同时,毛泽东

充分认识到第三世界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迫切需要通过寻求广泛和深入的反霸权主义、反殖民主义合作来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安全,再加之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反帝反殖的历史有着广泛的共性,是一支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反霸反殖的力量,因而毛泽东将这支力量与中国一同划分为第三世界。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与第二、三世界国家之间,第二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都有尚未解决的矛盾,但是面对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共同目标,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是可以结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

3. 三个世界理论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的跨国灵活应用。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以及西方不断殖民扩张,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的对立。作为当时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无疑美国和苏联是“世界城市”的典型代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经济薄弱,属于不发达国家,只能代表“世界农村”^[20],而中国国家实力同样相对弱小,属于“世界农村”行列。面对美苏霸权环伺,毛泽东将视角转向“世界农村”,大力发展同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及其他被压迫地区的关系,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应用于国际舞台,团结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被压迫民族以夺取反对美苏霸权的胜利。因此,毛泽东还曾多次公开说,“我们见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21]283}。

五、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因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放性和发展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化的、教条的,而是在为我们提供行动指南的同时通过实践检验自己,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自身进行完善和发展的科学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迅速分化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且这两个阵营的国家因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等因素而相互敌视、对峙和扼杀。最初毛泽东在结合中国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随着冷战两极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两大阵营的边界开始淡化。毛泽东因时而变,

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顺势提出了“中间地带”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并根据世界局势变化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最终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现实的情况,而不应当抱持昨天的理论一成不变,因为这种理论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而不能解决随着实践变化而产生的所有的新问题^[22]¹³⁹。毛泽东正是在秉持着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通过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局势的实时研判,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和世界形势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并以此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

(二)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之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久受殖民压迫的亚非拉国家利用欧洲殖民主义力量的衰弱和自身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所获得的驱动力,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进行了猛烈冲击^[23]。不可否认的是亚非拉国家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愿望,并且付诸了艰辛的抗争行动。但由于长期被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经济发展程度仍然相对落后,因而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会轻易放弃对这些亚非拉落后国家的控制和掠夺,而是采用了一种更隐蔽、间接的方式即利用自身经济优势,通过资本输出和金融垄断推行新殖民主义^[24]。不难发现,由于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亚非拉国家虽然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发展上仍受限制,抗争运动仅凭一国之力尚且不足以达到成功。亚非拉被压迫国家和民族通过实践认识到要想不被压迫就必须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团结起来共同抵制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三)冷战两极格局阶段性质变:国际行为体角色调整带来的国际矛盾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对峙为主要形式的两极格局形成。随着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美苏借助意识形态之争将自己的盟国紧密聚拢在一起,并不断向外扩张自身所在阵营^[25]。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以主权国家为主,且大多分属于资本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阵

营,国际矛盾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格局开始逐渐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破裂、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崛起。国际社会开始涌现出相当一部分的非国家行为体。西欧六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成立欧洲共同体来抵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而亚非拉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为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继开始南南合作与不结盟运动之后,成立了旨在从非洲根除一切殖民主义的非洲统一组织^[26]。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立而导致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此矛盾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以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为驱动力的阵营内部的矛盾,世界上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与美苏霸权主义的矛盾愈发凸显。

两大阵营的阶段性质变,为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资料和实践土壤,其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又激发和助推着毛泽东完善和创新这一新理论。

六、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当代强大生命力

(一)伟大的历史功绩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它突破了在冷战阴影下国际社会中单一的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社会性质划分两大阵营的标准,不仅为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提供了可行性方案,也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探索到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1. 弱化了意识形态差异,推动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重新评估,弱化了中国原来强调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中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建交开创了新的外交空间。同时,将中国归于第三世界,使中国把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视为己任,既增进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深厚感情,又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力。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外交秉持该理论,不仅通过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而且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顶层设计,对中国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2.进一步细化了第二世界,为优化中国外交提供了战略选择的科学指导。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普遍因受战争重创,实力受到摧残性削弱,而美国在战争中却更迅速地发展,并且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美国不断对日本和西欧等国进行名义上的扶持与实质上的剥削,并一直试图强化对其控制。日本以及西方国家面临着如何在不影响自己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摆脱对美依附、消除受苏威胁的问题。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根据其既是压迫者又是被压迫者的两重性,将其置于美苏两霸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免受美苏欺压与盘剥,提供了认知路径和实践方向的选择。

3.团结了第三世界,凝聚了反霸力量。对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虽然大部分国家已经宣告独立,但是由于经济落后,国家实力弱小,仍然被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上打压、政治上控制和军事上威胁与恫吓,实现国家真正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任务依旧严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一种切合当时国际格局性状的战略理论,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更易于接受和能清晰认知国际格局的新框架,有利于增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心,使之作为一支独立的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政治博弈力量,更好地打破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话语权的垄断,进而扩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对当今中国外交具有科学的引导作用:以美日在非洲对“一带一路”的阻击与遏制为例

毛泽东思想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是冷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该理论尚未过时^{[27]42-47},而是在新时代有了新使命。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更加频繁,相互依存也更加紧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

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始终坚持以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特别是“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更加紧密,既推动这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在客观上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有效抗衡了美国更具全球性、扩张性的新霸权主义^{[29]70-74}。可以说,“一带一路”是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甚至以各种方式唱衰、抹黑中国的对外援助,其中以美国(第一世界)和日本(第二世界)在非洲地带(第三世界)对“一带一路”的遏制最为典型。

1.美日在非洲遏制“一带一路”的表现。“一带一路”的良性发展使中国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的影响力愈发显著。对此,美国着力在非洲布局对冲“一带一路”,以弱化“一带一路”在非洲的中国之效。在2018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蒂勒森访非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媒体上公开声称,中国对非洲的开发援助让中国从非洲得到了不菲的资源,但是非洲国家并没有因而得到发展,反而背上了沉重债务,“导致贫困”。2022年5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访问非洲时更是蓄意挑拨中非合作,称非洲国家选择中国华为公司作为通信商,就意味着将自己国家的数据主动移交给了中国,放弃了主权,从而让自己置身于无法察觉的监视之中^[30]。日本作为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第二世界国家,虽然还时不时地寻求与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但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使其在非洲对“一带一路”的阻滞和污蔑中不减反增。2017年9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公开表示要与印度一同推进“亚非增长走廊”(AAGC)的建设,以求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制衡“一带一路”^{[31]73-89}。2022年8月,在突尼斯召开的日本主导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考虑自身利益与非洲国家探讨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同时,再提所谓

的“中国债务陷阱”,将日本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相比较,认为中国加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压力,而日本将实现与非洲的共同发展^[32]。

2. 美日在非洲挑战“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美国和日本通过多种手段与方式阻滞“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平稳运行,不仅对“一带一路”和非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也严重波及了自身发展。第一,美日通过捏造事实、篡改数据和鼓吹中国“威胁论”等手段抹黑与诬陷“一带一路”的非洲之效,夸大“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的风险,导致部分非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认为“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的问题远超于利益,带来的投资将加重其债务负担,未来非洲国家在无法偿还债务时将被迫依附于中国。这些恶意揣测和负面评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态度,使得“一带一路”在非洲大陆的发展面临更多本可以避免的困难和问题。第二,虽然大部分非洲国家认可“一带一路”,相信中国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济援助和共同发展的初衷,但是美日利用自身在非洲地区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以非洲大陆为“战场”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非双边政治互信,部分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和态度也趋于保守和警惕。这就导致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基础设施建设滞缓,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甚至面临国内矛盾激化的风险。第三,美日在非洲挑战“一带一路”,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中日关系、美非关系和美日关系,而且也为自己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在改善着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促进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美日一味地阻滞“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发展,或将引发非洲国家对美日的抵触态度和逆反心理。同时,面对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日趋严厉,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必须紧随其后,但借助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来发展本国经济对日本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所以日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想方设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除此之外,随着“一带一路”国际认可度的提高,美日不择手段对“一带一路”的肆意抹黑,势必会在国际社会上造成更广

的负面影响,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3. 应对美日在非洲挑战“一带一路”的建议。美日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亟须破解的难题,应当多方位、多角度设计应对方案,积极应对和化解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挑战与风险。第一,展开双边对话,着力破解债务难题。中非双方应加强对话,进一步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努力缩小和消除中非双方在“一带一路”投资和建设方面的认知逆差,将“一带一路”的愿景与非洲民众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要充分认识到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一带一路”为平台,主动帮助非洲各国探索平衡发展融资与债务增长的有效途径,有力回击美日宣扬的中国对非“债务陷阱”这一谬论^[33]。第二,继续发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非洲一体化建设的核心领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要抓住基础设施这一突出优势,适时合理地调整对非相关政策,提高非洲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度,借美日在非洲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倒逼“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第三,加大对“一带一路”倡议成果的宣传。舆论污蔑是美日抹黑“一带一路”的主要手段。面对舆论的攻势,一方面我们要讲好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非洲国家一同推动高质量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的进步故事,展现出中国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美好形象;另一方面,不要因为美日的抹黑聒噪而滞缓了发展的步伐,非洲各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红利的追求才是“一带一路”在非洲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践大道之行,必成其久远。正如非洲谚语所说,“青蛙的鼓噪,岂能阻止牛到河边饮水”(the cries of the frogs will not stop a cow from drinking water)。

七、结语

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站在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在对国际关系格局精准

研判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不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时期制定的战术战略在外交政策和方针上的创新性发展与运用。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取得的重大成效以及美日在非洲对“一带一路”的冷战思维挑战也在客观上鲜活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于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反对美国及其西方大国的新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引领价值。特别是当今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次深入理解和精确应用毛泽东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可以为中国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好的借鉴,必将收获更丰硕的外交成果。

注释:

①哲学意义上的“三个世界”最早是由柏拉图提出来的,他将世界划分为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在柏拉图之后,波普尔再次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界定了“三个世界”,即第一个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第二个世界是人头脑中主观的精神世界,第三个世界则是客观化的知识世界。这些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三分世界,并以此来解释世界。

②详细论证参阅钮维敢《论中间游移力量——毛泽东思想“中间地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22(2),31-42。

参考文献:

[1]港口变军事基地?美针对中国的抹黑正被逐一击破[BE/OL].中国新闻网.2018-11-12.http://news.china.com.cn/2018-11/12/content_71884409.htm?agt=1486.

[2]商务参赞谈“一带一路”:立陶宛—“一带一路”上的“潜力股”[BE/OL].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7-08-22.<http://lt.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708/20170802631247.sht-ml>.

[3]ENVER H.Imperialism and the revolution[M].Charleston: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0.

[4]A. DOAK B. China and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M].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5]村上敏明.三个世界的划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阶级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1978(6).

[6]V. KUBAIKOVA, A. A. CRUICKSHANK. Marxism-Leninism an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7]PETER V. N.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8]吴志生.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对三个世界理论的攻击看阿党关于世界划分的主要论点[J].南洋问题研究,1978(3).

[9]李娟.“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人民论坛,2016(5).

[10]王新影,李雪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发展和现实启示[J].教学与研究,2022(11).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钮维敢.论中间游移力量:毛泽东思想“中间地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宁夏社会科学,2022(2).

[15]宫力.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战略的由来[J].党校科研信息,1991(29).

[16]翦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D].湘潭大学,2020.

[17]夺取新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N].人民日报,1972-10-01.

[18]史平.新中国外交战略传播的演变及其启示[J].今传媒,2011(19).

[1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杨值珍.“三个世界”战略与中国革命经验的内在逻辑[J].江汉论坛,2008(8).

[21]裴坚章.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2]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3]徐煜.20世纪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24]许乃炯.战后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国家的掠夺空前加深[J].世界知识,1965(7).

[25]高粉仙.冷战格局形成认识:对意识形态的分

析[J]. 沧桑, 2008(3).

[26] 詹世明. 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一体化中的历史作用[J]. 西亚非洲, 2013(1).

[27] 姜安.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过时了吗?[J]. 历史评论, 2020(4).

[28] 习近平提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BE/OL]. 新华网 2022-10-16. 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16/c_1129066882.htm.

[29] 韩玉贵, 王域霞. 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的新特点[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6(2).

[30] 美副国务卿访非期间声称“选择华为意味着放弃

主权”, 外交部回应[BE/OL]. 新浪网. 2022-05-09. <https://news.sina.com.cn/o/2022-05-09/doc-imcwiwst6443315.shtml>.

[31] 楼春豪. “亚非增长走廊”倡议: 内涵、动因与前景[J]. 国际问题研究, 2018(1).

[32] 岸田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 宣称日本对非洲做法“与中国不同”[BE/OL]. 环球时报. 2022-08-29.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9Qgo8JMxhh>.

[33] 外交部介绍秦刚外长访问非盟等相关情况[BE/OL]. 中国日报网. 2023-01-12.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1/12/WS63bfc4b4a3102ada8b22aeb1.html>.

Mao Zedong Thought of Three World Division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aking the US and Japan’s Containment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 Africa as an Example

Niu Weigan, Xing Yi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2616)

Abstract: The “the Belt and Road” i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three world division the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erms of semantic connotation and actual geography. In the 1970s, as the United States’ external expansion led to its own mire in war,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as increasingly better th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ce of the treacherou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ao Zedong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dividing three worlds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middle zone” theory and the “two middle zones” theory, in order to unite the second and third world countries to jointly oppose hegemonism and maintain world peace. The three world division the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as a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theory of Marxism Leninism, even if projected across time and space on the regions and relevant actors involved in the “the Belt and Road”, still has a strong insight function and perfect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d War thinking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relevant third world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the Belt and Road”, and can thoroughly clarify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of the US and Japan’s challenge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 Africa, and excavate the root of its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The challenge of the Cold War thinking of the US and Japan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Africa is a typical contemporary example of the three world theory. The three world the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which isolates the first world, strives for or divides the second world, and unites the third world, should be designed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US and Japan to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ld war thinking in Africa. Thus,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era value of the theory that still has a strong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leading force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occurred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wh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reshuffled.

Keywords: three worlds division theory; “the Belt and Road”; Africa; Cold War legacy perspective; great power game

(责任编辑 刘家俊)